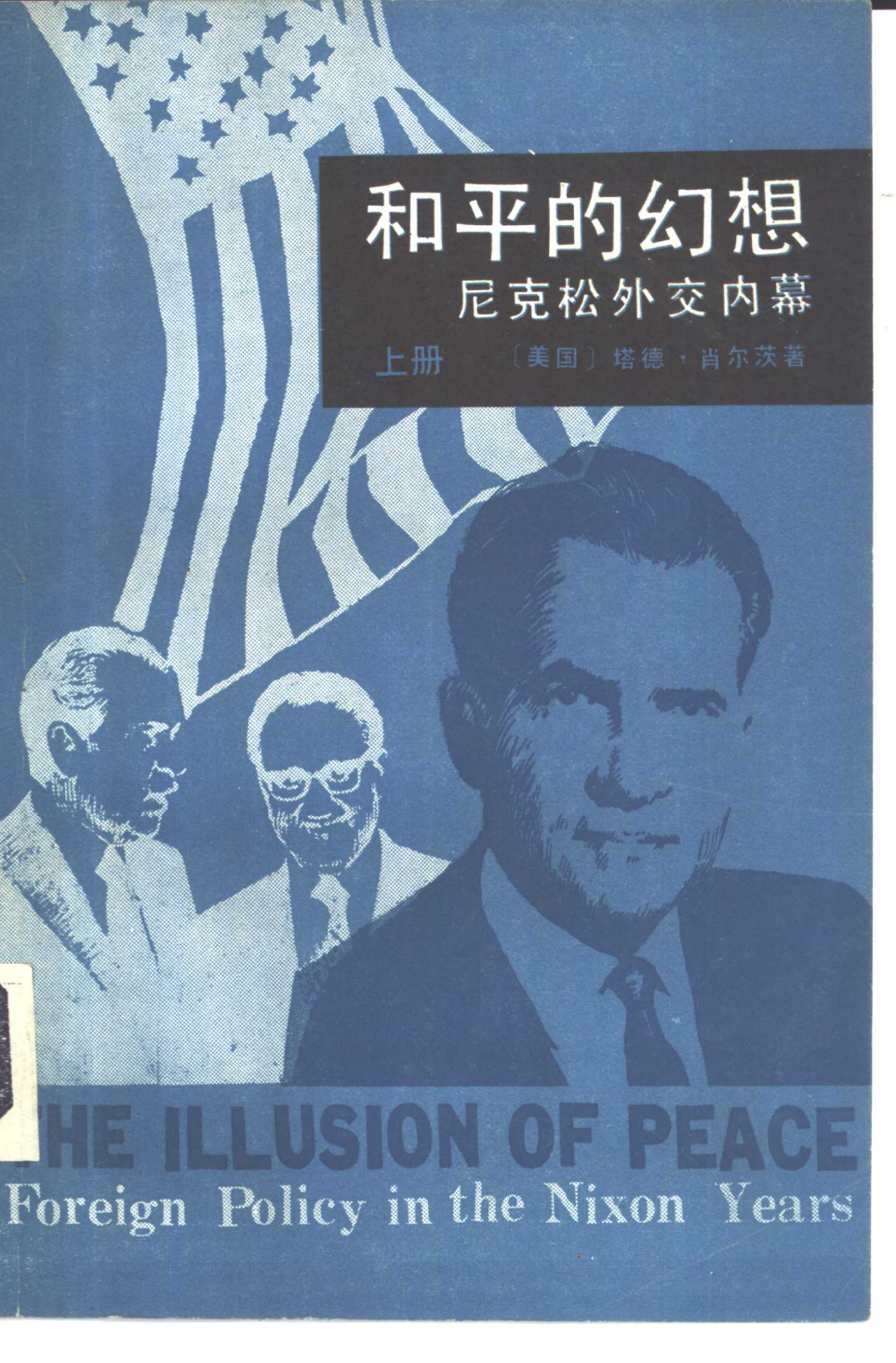




和平的幻想

尼克松外交内幕

上册

〔美国〕塔德·肖尔茨著

THE ILLUSION OF PEACE
Foreign Policy in the Nixon Years

和 平 的 幻 想

——尼克松外交内幕

上 册

〔美国〕塔德·肖尔茨 著

邓 辛 王殿明 王 婷 译

叶 周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1982 年 · 北京

511
71
859

3、

和 平 的 幻 想

——尼克松外交内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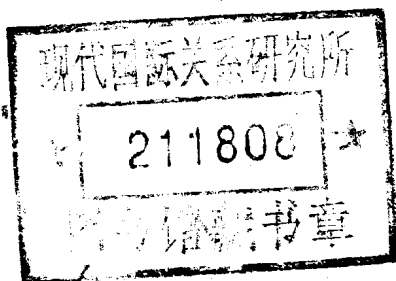
下 册

〔美国〕塔德·肖尔茨 著

李 道 庸 陈 启 迪 译

邹 震 王 慧 敏

白 自 然 校



Y13456 / de

商 务 印 书 馆

1982年·北京

P

1982, 12, 25

Tad Szulc
THE ILLUSION OF PEACE
Foreign Policy in the Nixon Years
The Viking Press • New York
1978

根据纽约瓦伊金出版社1978年版本翻译

和 平 的 幻 想
——尼克松外交内幕
上 册
〔美国〕塔德·肖尔茨 著
邓 辛 王殿明 王 婷 译
叶 周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 庆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统一书号, 3017 • 225

1982年1月第1版

开本787×1092 1/32

1982年1月重庆第1次印刷

字数321千

印数1~20,000册

印张15 5/8

定价: 1.60元

Tad Szulc
THE ILLUSION OF PEACE
Foreign Policy in the Nixon Years
The Viking Press • New York
1978

根据纽约瓦伊金出版社1978年版本翻译

和平的幻想
——尼克松外交内幕

下 册

〔美国〕塔德·肖尔茨 著

李道庸 陈启迪 邹 震 王慧敏 译

白 自 然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 庆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统一书号：3017·309

1982年1月第1版

1982年1月重庆第1次印刷

印数1—26,800册

开本787×1092 1/32

字数391千

印张19

定价：1.95元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以生动的笔法叙述了尼克松时代美国的对外政策。尼克松于1969年1月入主白宫，1973年连选连任，1974年8月因水门事件被迫辞职。在他就任美国总统五年又八个月间，美国的对外关系接连发生震动世界的大事件，其中包括：1971年夏派基辛格秘密访华，1972年春尼克松访华，同周恩来总理联合发表《上海公报》，奠定尔后中美关系发展的基础；开展美苏关系，美苏举行三次最高级会议，签署所谓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结束印度支那战争；1973年中东10月战争，派基辛格调停阿拉伯—以色列关系，使双方军队脱离接触；插手智利反阿连德政府的军事政变，等等。

本书作者塔德·肖尔茨是美国有名的政论家，曾任《纽约时报》的政治记者、外交记者及驻外记者二十余年，从事国际关系的著述，写作十余种书。他认为，对于尼克松时代的美国对外政策，唯有历史才能作出判断，对于尼克松其人作为政治家，也只有时间才能作出恰如其分的判断。

本书对了解尼克松任总统期间的对外政策的制订及执行情况，对了解美国政坛的风云颇有参考价值。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卷	
1969年——希望的一年	4
第二卷	
1970年——战争的一年	254
第三卷	
1971年——震动的一年	493
第四卷	
1972年——缓和的一年	660
第五卷	
1973年——“和平”的一年	850
第六卷	
1974年——收场的一年	987
索 引	1051

前 言

理查德·尼克松坚信，对外政策是他总统任期中最富有建设性和最积极的一个方面——美国和全世界有许多人赞同他的这一说法。他自称，这方面的工作是他在白宫的岁月中作出的不朽贡献。在水门危机时，他也一直用他的对外政策来作为保卫自己的主要手段。

多年来，美国以及整个世界确实把尼克松当作一位具有非凡创造性的决策人。他和基辛格并列为谋求和平的政治家。他为了美国，结束了越南战争，与苏联建立了缓和，打开了同中国的对话，并且给中东带来了形式上的和平。

然而，尼克松的这种形象掩盖了许多事实的真相，因而许多发生在这惊人的复杂年代中的事情，都不得而知。随着情况的发展，现在已经越来越清楚，尼克松给美国和全世界带来的，只不过是和平的幻想而已。

本书真实地记述了尼克松如何指导外交政策。我始终如一地既关心秘密的方面，也关心公开的方面，并注视着在执行美国政策中，这两个方面的矛盾。

本书中的一些情况和印象来自我的亲身经历，那时是尼克松在白宫第一次任总统期间，我在华盛顿当报社记者，每天报道白宫对外政策公开的执行情况。我尽可能阅读有关尼克松和基辛格所做的工作的一切公开发表的材料，包括图书、

国会报告、杂志和报纸。显然，这些材料对开阔我的眼界是有帮助的。

本书利用了整个尼克松时代的公开文件，以及从华盛顿和通过国外各种途径获得的资料，其中有的迄今仍属美国政府^{vi}的密件。我相信，这些资料将对尼克松政府的公开的和非公开的态度可作鲜明对比。

就我个人来说，尤其重要的是，我能有机会研究许多机密资料(有些机密资料我直接引用了)，并且能够和一些美国和外国的军政界官员讨论尼克松年代的历史。这些官员在不同程度上都卷入了1969年至1974年美国对外政策的制订。他们中间有前内阁官员、美国驻外大使、总统私人顾问团官员、白宫高级顾问、行政官员的助理、外交家和军人。在和他们谈话的过程中，我逐渐对这些事件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同时也使我感到一种职业性的震惊——我们美国人和新闻记者对尼克松和基辛格的政策的实施知道得太少了，尤其是我们新闻记者，我们的工作就是向公众及时报道消息。我们经常是被灌输了许多虚假杜撰的东西，而且往往被引入歧途。这样的说法并不过分。

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访问过高级官员，也访问过一些知道事实真相的低级人物。我和他们进行了几十次、几百次的谈话，有些谈话延续了好几天。诚然，他们对各种问题的理解和解释是有很大差距的。在本书中，我尽量保留这些分歧，最后好歹作出了结论和判断。

协助我调查并贯连这些历史事件的美国人都是诚实的公职人员，有些仍在政府供职，有些则已退休，他们主要是帮

助我搞清事实真相。在绝大多数的场合下，他们并不想把他们的观点强加于我，即使我同他们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并不总是一致。我衷心感谢他们对我的信任，感谢他们花时间和精力向我讲述了他们亲身的经历。

一些外国政治家和外交家向我提供了可贵的情况，其中有些情况是从未披露过的。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向我提供了他们自己对某些情况的不同看法，而这些情况过去都是从美国的角度去分析的。

国会事务和军事方面的专家们从各自的专业领域方面给了我不少帮助。他们中有些人曾经亲身参与了当时的事件。他们的帮助使我更清楚地懂得许多政策的背景情况。

我感谢他们每一个人。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出版商瓦伊金^{vii}出版社，我的编辑伊丽莎白·西夫顿，我的出版代理人卡尔·D·布兰特，我的朋友丹尼尔·I·戴维森，他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建议，理查德·霍尔布鲁克，作为《外交政策》杂志的总编辑，他鼓励我写出越南和平谈判的真相；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是，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在本书的四年写作过程中他们给了我耐心的帮助。

塔德·肖尔茨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1977年10月

第 一 卷

1969年——希望的一年

第 一 章

3 让我们确立这样的目标：让不知道有和平的地方欢迎和平；让脆弱的和平得到巩固，让暂时的和平变为永恒……。

对抗的时期过去了，我们正进入谈判的时代……。

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向各种思想开放，向物资和人员的交流开放——这个世界的民族，不论大小，都毋需生活在愤怒的孤立之中……。

我们不能指望使每个人都成为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能够设法使任何人不成为我们的敌人……。

让我们同任何愿意同我们合作的人合作，削减军备负担，巩固和平大厦，帮助那些贫穷饥饿的人们……。

对于那些情不自禁地想利用软弱的人们，让我们明确地告诉他们，我们将永远象我们需要的那样无比强大……。

让强者和弱者都听到这个信息：我们寻求的和平——我们想要赢得的和平——并不是要战胜别国人民。我们的和平将“医治创伤”，给苦难者带来同情，向

反对我们的人表示谅解，为世界各国民族带来选择他们各自命运的机会。

这些话带有威尔逊的味道，约翰·F·肯尼迪的腔调。美利坚合众国第三十七任总统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就这样在他的1969年1月20日就职演说中为他的新政府确定了他无比雄心壮志的外交目标。尼克松在随后的二千零二十六天中，直到1974年8月9日他因水门事件的罪责而被迫辞职为止，在美国和世界外交舞台上作了壮观的、富有创新精神的、但又引起争议的表演。他的有声有色的精彩表演把人们吸引住了，使他们不再去注意尼克松政策中的各种缺陷。然而，尼克松年代——以及建造他洋洋得意地称之为的“和平大厦”时——却充满着许多新的起点、新的突破，富有想象力却又狡诈十足的外交，令人目瞪口呆的突发事件，无人道地使用毁灭性武力、边缘政策和冒险政策，有意制造的和确实存在的危机，玩世不恭的态度，冷眼观望的现实政治，玩弄权术以及动辄采用的保密手段，等等。不过，大部分美国新政策是经过深思熟虑、妥善安排的，但也有不少是灵机一动、草率执行的。

尼克松政策的重要的几着是：同苏联搞缓和，打开通向中国的道路，以及越南的和平解决。这些是逐步演变的。最初它们不过是抽象的概念，还必须纳入国际政治的和谐的整体，等待合适的时机，并和世界其他潮流结合起来。这些设想还必须通过熟练的谈判才能得到实现，有时还需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尼克松在他的战争与和平的综合战略平衡中是

经常凭藉武力威胁的。无论对朋友还是对敌人，都需要加以操纵，对他们进行欺骗或收买；有时候，表面上是胜利了，但实质上充其量是妥协，在最坏的情况下甚至是幻想。

理查德·尼克松是个不止不息的旅行家。在世界的每个舞台上，他公开表演他的战略，追求戏剧性的效果，犹如一个老练的演员。他策划于各种秘密场所——椭圆形办公室、白宫楼上的林肯会客室、隔壁灰色华丽的行政大楼内的特别办公室、马里兰州山区的戴维营的小屋、以及他自己的圣克利门蒂的庄园和比斯坎岛的院落。他的某些政策和果断行动是他深夜在林肯会客室深思熟虑后作出的。他进则到国外出色地表演一场，退则深居简出，但都使他的形象越来越高大。作为个人外交的热诚信奉者，尼克松是最常旅行的美国总统，甚至超过富兰克林·D·罗斯福旅行的次数。罗斯福在战时曾到过卡萨布兰卡、开罗、德黑兰和雅尔塔。尼克松在任职期间访问了三十一一个国家和地区，从南越到苏联、中国、沙特阿拉伯乃至西班牙，其中有些国家访问了好几次。

旅行和个人接触是尼克松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最高级会谈在期限方面的无情压力，不可避免地迫使他过于仓猝地作出决定，因而使他后悔莫及。下面是一些妥协和灵机一动而作出的决定：1972年同俄国人就战略武器的最后一分钟协议；1971年在亚速尔群岛关于美元贬值的协议；1974年在中东的匆促访问中向阿拉伯人所作的承诺。尼克松是赞成与外国领导人会见之前有充分准备的，但另一方面，他也被召开最高级会议的动力所冲昏头脑。他不允许尼克松的任
5 何最高级会议显得好象有点失利的样子。

按照定义，外交政策的各个组成部分是错综复杂的，所以往往不可能把长远的创举和应急的临时措施区分开来。尼克松的外交更是如此。

他的第一次重要的国外旅行是赴西欧，那是在他上任后一个月又三天。在随后的五年半内，尼克松的喷气式座机空军一号（尼克松命名为76年精神号）穿梭般地飞越各大洋和各大洲。他是第一个访问北京、莫斯科、布加勒斯特、华沙以及中东的美国总统。对西欧的访问更是经常的事。他简直游遍了全世界。从1969年到1974年，他国外旅行的行程达十四万七千六百八十六英里。1969年是创纪录的一年，他在海外旅行了四万六千一百七十三英里。

几乎所有的各国重要领导人都曾一次或数次前来会见尼克松，从苏联的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到英国和日本的历届首相，伊朗国王，以色列总理戈尔德·梅厄，南斯拉夫的铁托元帅，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以及西德总理威利·勃兰特。（但中国人却大大地破例了。）尼克松庄严地站在白宫的南草坪上欢迎这些外国显要人物和举行国宴招待他们的盛况，都已成为华盛顿生活的特征，他甚至独出心裁，让白宫警察穿上歌剧人物式的制服，以壮观瞻。

毫无疑问，作为一个政治家，尼克松最擅长于外交。他最喜欢阅读有关外交的书籍。在谈话中，他也离不开外交政策。直至他痛苦地结束他的政治生涯时，仍用外交为他的堡垒，在这里他是最安全不过了。他热切希望当历史对他作出判决时，首先考虑的是他在外交方面的成就。但他可能万万没有想到，有一天，即使在外交方面，他的成绩也是远非十

全十美的。

在尼克松广泛地考虑的问题中，占第一位的当然是设法使美国从越南战争中脱身，并且和共产主义世界改善关系。但是，尼克松政府一开始就主张各种情况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特别是美苏关系。因此不易弄清各个发展阶段政策执行的具体情况。尼克松在他第一次就任总统之前，就认为，越南问题与缓和是明显地联系在一起的。他还认为，只有苏美合作的条件下才能消除中东危机。在越南问题上，尼克松及时看出，在按照他可以接受的条件停止越南战争之前，必须先与苏联搞缓和并和中国达成谅解。缓和是一个长远的目标，而越南问题尽管令人烦恼，却是一个短时期内存在的问题。但是，尼克松也很清楚，缓和之成败，取决于越南问题的解决。

这些就是尼克松制定他的对外政策所依据的基本设想。他无法用文字把这些设想和盘托出。他在就职演说中曾强烈地暗示过。但是他根本不知道对方是否也有同样想法。无论如何，尼克松在主持白宫的第一个星期，就曾经下令，按轻重缓急，就十个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其中首要的是越南、中东、美国的军事态势和东西方的关系。在他的思想中，这四个问题是互相关联的。

除了这些在政策上考虑的基本范围之外，还有不断出现的足以导致危机的意外事件。不足为奇的是，莫斯科不时考验尼克松的胆量（他经常认为它正是这样做的），这正如它对战后每一个美国总统所进行的考验一样，而另一方面却又在试探缓和的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方面从未进行过这

种游戏。全球性的联系，即想象中的联系，往往会由于处理危机时打乱了全盘政策，以致世界棋盘上的形势遭到曲解。而对突如其来的危机作出的神经质的反应或灵机一动的决策，即使是高水平的、独立思考的分析家，也容易认为是根据全面计划的战略所作出的深思熟虑的反应或首创事物。当然，尼克松也能熟练地打危机牌；故意制造的军事警报和军事危机被利用来取得外交优势或左右外交谈判。在和俄国人打交道的时候，尼克松颇有办法地使莫斯科卷入联锁圈套中。1970年因苏联核潜艇基地而爆发的古巴“小危机”就是一例。华盛顿玩弄这一事件时，正是中东的严重危机正在发展的时候：受苏联教唆的埃及人正在违反已经岌岌可危的埃—以苏伊士停战协定，叙利亚用苏联提供的装备入侵约旦。与此同时，越南和谈陷入僵局；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当选为智利总统。

一旦受到挑衅或预感到挑衅出现时就用武力出击，这就是尼克松的本能。有时，他下密令采取“预防性”或“保护性”措施。越南和平谈判的历史说明，不同强度的空中打击是同巴黎的或其他地方的外交行动周密地配合的。当遮盖着秘密的帷幕逐渐拉开的时候，就越来越清楚地知道，尼克松的“和平大厦”却点缀着轰炸、轰炸的计划和轰炸的威胁——从印度支那到北朝鲜。尼克松对外交政策的领导并不是平平静静的，并不象白宫所描述的那样，也不象他的第一个就职演说中的理想主义所暗示的那样。尼克松尤其是不能容忍这样一种想法，即美国或美国总统是一个毫无办法的巨人。

另一件自相矛盾的事情，就是尼克松经常做他口头上说他永远不会做的事情，譬如，他不坚持北越的军事力量要撤

出南越，或者他竟同意美元贬值。不论是改变他的公开政策承担的义务，还是突然转而使用武力，尼克松总是利用他的不可捉摸的特点作为外交上的武器。可是他终于发现他自己的概念使他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受到束缚——譬如缓和。最后，他利用外交来掩盖他在国内遭到的耻辱。1974年中期，他匆匆忙忙访问中东和莫斯科，既是外事活动，也是对付水门事件的手法。只是在尼克松政府的最后一年前后，对他的外交政策的评论材料中才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修正意见”。

总之，尼克松的政策好歹把美国的对外关系引向一条新的道路上去。在许多方面，这些政策是无法再改弦易辙了。它们标志着美国剧烈地改变了它对盟友和敌手的态度。基本关系作了调整，新的真理逐步得到承认：美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力量在印度支那和别的地方的确是有限的；第三世界国家在世界政治中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美国必须习惯于在同苏联的核均势下生活，而且不再同它对抗下去；必须使大陆中国参加国际政治组织；美国削减它担任世界宪兵作用的时候也到来了。最后这一点曾经被广泛地宣传为尼克松主义，看来，它是其他各种政策观念的必然结论。但是，这个目标尼克松永远没有完成，也许因为它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如今该是卡特政府决定美国在这个急剧变化着的世界中所占的位置。问题至今仍旧是在放弃了世界宪兵的责任之后，美国是否还能站得住脚。

在尼克松年代，美国作了种种努力调整它的立场以适应七十年代的全球现实，即使许多调整的措施是不完整的和考虑不周的，其中最糟糕不过的是那些动摇了美国同西欧及日